

杜维明与陈来

陈来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1054

导读：今天推送的内容是陈来教授的两篇短文，陈教授在文中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杜维明先生。第一篇是陈教授为《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写的跋，文中回忆了他在哈佛燕京学社时期参与杜先生组织的思孟读书会的经历；第二篇是陈教授 2007 年在“儒学第三期”座谈会上的发言，陈教授评述了杜先生在 80 年代对儒学保存与传播做出的不可取代的贡献。

从陈来教授简炼的言语中，我们不仅在学术史意义上理解了杜先生于儒学第三期、于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意义，更在情感上体会到了二位先生对文教存续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思孟读书会

（《思想 文献 历史——思孟学派新探》跋）

司马迁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汲，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荀卿列传》）按子思在汉代以前的地位并不突出，因《中庸》在六朝隋唐时，渐渐受到注意，宋代“四书”结集，《中庸》的地位大大提高，子思的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子思地位的提高与孟子升格的运动也密切相关，孟子为子思再传门人，《孟子》书中论诚与天道的思想与《中庸》完全一致，更使得宋代思想家重视子思作为孟子思想来源的意义。如朱子在《中庸章句序》里明确把颜、曾、思、孟作为孔子之后道统相传的线索。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把子思、孟轲连称，而加以批评，也证明子思、孟子思想有一致性。近代以来，郭沫若等根据这些历史记述，始用“思孟学派”的概念分析先秦儒家思想史，现在已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史概念。

《汉书·艺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其书隋唐皆有著录，但宋代以后已经遗失，故现代思孟学派的研究，除了《中庸》、《孟子》而外，难以深论。自 1970 年代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和释读，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缁衣》等篇，都引起了学者重新认识思孟学派的极大热情，出现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从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方面，对《中庸》等思孟学派的文献的新的诠释，也在中、英文学界不断推陈出新，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

2006 至 2007 年度，哈佛燕京社的中国访问学者里，中国哲学的专业学者特别多，其中有常规项目的哈佛燕京青年访问学者，也有合作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于是，杜维明先生和我商量，这么多中国哲学方面的学者会聚哈佛，十分难得，应该一起读读书，共同研讨一些问题。最后决定大家一起参加杜先生主持的读书会，每星期五下午在 4 Bryant 的 Yen-ching House 进行经典会读。

这个读书会是杜先生为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开设的，近几年一直在读思孟学派的文献。这样，从 2006 年 9 月开始我们许多人都参加其中，形成一个思孟学派的研讨

班 (seminar)，以期集中讨论有关思孟学派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广泛涉及思想、文献、历史。参加的人除杜先生和我以外，有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也有在哈佛的其他访问学者。其中：陈静、梁涛、张丰乾是专门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学者，自然是研讨班的主力；干春松研究近现代儒学，刘宁研究古代文学，宣方研究中国佛教，方旭东研究宋元明理学，不同的专长和视角，交映成趣；龚群、卢锋则是西方伦理学的专门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也对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东亚系的博士生，如吴荣桂 (Micheal Ing)、钱观长 (Clint)，陈丹丹等，在讨论中都提出了有见地的问题及理解。康州大学的桂思卓 (Sarah Queen) 中间也来了几次，她是《五行》的英译者和专家，她的加入促进了对相关文本的深入理解。我们第一个学期念竹简《五行》，第二个学期念《中庸》，每周会读，从不间断，在杜先生外出的时候，我也帮忙主持一下。在问题意识上，我们特别注重围绕杜先生关于《中庸》的诠释，展开对思孟学的研讨；在若干重要之点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相当精彩。

在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跟大家约定，希望大家在会读过程中，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到了 2007 年 4 月底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在杜维明先生的主持下，由张丰乾负责会议准备工作，我们在哈佛大学人文中心举办了一次工作坊 (Workshop)，大家都宣读了论文，进行了评议和讨论。在工作坊上，大家同意尽快修改论文，然后把这一年会读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贡献给学界。我们相信，这对进一步推动思孟学派研究的深入，对有关思孟学派的概念、问题、文本做深一步的探讨，以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和兴趣，应该是有益的。2007 年 8 月，趁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会期间，由杜先生主持，我们大家又进行了一次讨论，并确定了集结论文的安排。

在某个意义上说，本书可谓哈佛会读思孟的一个纪念，但其中的论文对思孟学派的研究确实都有相当深入的推进，在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解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我们期望，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将促进思孟学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杜维明与“儒学第三期”

(陈来教授在 2007.10.29“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座谈会的发言)

杜维明先生是 1978 年第一次回来的，来了一个月。1979 到 1980 年又来了差不多一年，1983 年又来了一次，那是来参加汤用彤先生的那个会，当时李泽厚先生也在，后来有《燕园论学集》发布。然后就是 1985 年了，此后几年来的比较频繁了。1989 年以后到 1994、1995 年有一个间隙没有来中国。我第一次见他是在 1980 年北京市哲学会，是他做报告，一直到 1985 年，其实这一段他没讲什么新儒家，没讲牟宗三、也没讲唐君毅，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新儒学、港台新儒学的那一套东西他并没有讲。1980 年他讲的是《道、学、政》。

到了 1983 年来，他给的论文是讲“体知”，收入《燕园论学集》里。1985 年，他讲的是“儒家哲学”，在北大开的课。1985 年开始就有文化热了，这个时候他主要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如果说他前两次来是讨论中国哲学，那么他这一次来就是讲的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你讲当代新儒家，也就是港台的当代新儒家，这个研究跟杜维明先生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还要澄清一下：

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了杜先生来，传播了新儒家这些思想，我们才开始研究这些港台新儒家的。“第三期”的问题，杜在北京是 1985 年开始讲了，这个“第三期”发展和文化讨论有关系。他在 1985 年讲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热，儒学第三期的意思就是儒学仍有当代意义，仍然可以进行现代转化，如果没有现代转化、没有现代意义就没有第三期了，所以他更多介入的是文化。文化的讨论我觉得杜先生的功劳是不小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庞朴先生七十年代末写了孔子的文章，李泽厚先生七十年代末也写了孔子的文章，但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批判儒家的多了起来。特别是到了 1982、1983 年以后，由于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思潮的变化，基本上来讲有点像五四那个时代思潮的动向，就是对传统进行批评批判。我那个时候思想也是这样。那是现代化动员的时代，大家都有启蒙的意识在里面。

那时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儒学的声音，我们本土没有一个儒学发出的声音。梁漱溟先生那时已经不管这些事了。杜先生的功绩在于把海外、包括英语学界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所谓儒家人文主义的各个侧面等等带进来，作为当时文化热讨论里面的几大热点之一，使讨论更加多元化了，使得文化热不仅仅都是反传统的，而多了一个传统的声音。这个声音从当时到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儒学的第三期，就意味着儒学还有发展，这就是儒学的复兴，所以在文化热中学者把杜先生作为“儒学复兴派”。

所以，杜维明先生在中国大陆的功绩，并不是把新儒学、特别是牟宗三他们的东西带进来，扩大牟宗三的影响。他更多是把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和现代意义，和外部世界讨论的丰富性带进来，使我们的视野开阔多了。当然，不等于他当时讲了就有很多人同意，他讲的恰恰是很多人都反对的。年轻学者像杨念群、陈奎德都写了文章，当然还有李先生和朱先生他们。我记得当时黄克剑也在《读书》写了文章，基本是对杜的观点的否定。当然更不用说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了。但我认为杜先生有一点是很好的，他始终是以非常开放的态度面对批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他始终用开放的态度来和别人交换意见互相沟通。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你要碰到台湾其他的新儒家，恐怕就很难这样沟通了。另外，杜先生他本身虽然是新儒家，不同意五四的观点，但是他总是说他对五四有同情的了解。他当时有一个讲法，说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五四的继承人，而且他也经常批判所谓“封建遗毒”。这方面我觉得他非常开放，不是纯粹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学者。

至于儒学第三期，我们知道杜先生有两个讲法，一是顺着牟宗三讲，就是从先秦、宋明到现代；一是从中国、到东亚、到世界。可是“新儒学”这个概念，我们讲到“新儒学”、“新儒家”的时候，杜先生讲的还是在熊十力、牟宗三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是在这个线索下面发展的概念。所以杜先生新儒学的概念、新儒家的概念，没有他儒学第三期的概念那么广。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李先生他也讲荀子呀、马克思呀等等，就是强调新儒学、新儒家这个概念本身也可以是很丰富的。所以，如果我们脱开香港或者台湾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儒学当代和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可能是熊十力、牟宗三的一枝独秀。所以如果我们说新儒学在中国不仅受到研究，将来它本身有所发展，这个发展一定是超越所谓心学的系统的，是非常丰富的。